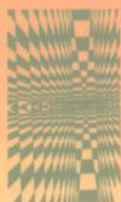


zhangshuguang



jingjixue
shupingji

张曙光 经济学书评集

张曙光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 张曙光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9

ISBN 7-5005-3219-9

I. 张… II. 张… III. 经济学—图书—书评—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4837 号

G03/00/0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社址: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9.375 印张 223 000 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19.00 元

ISBN 7-5005-3219-9/F · 299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0. 自序·····	(1)
1. 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咨询·····	(7)
2. 推进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探索 ——评郝云宏等著《经济政策学》·····	(23)
3. 我国预期理论研究述评·····	(37)
4. “计划者”的理论概念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反思·····	(46)
5. 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共同成果 ——评《生产性事业单位改革探索》·····	(63)
6. 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 ——兼评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	(71)
7. 探寻生产的制度结构——评盛洪著《分工与交易》·····	(89)
8. 腐败问题的再思考·····	(99)
9. 论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	(106)
10. 中国的制度分析理论：三个理论框架的比较 ——兼评刘世锦博士新著《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 论》·····	(124)
11. 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 ——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138)
附：张曙光挑战国家能力论，胡鞍钢接招答辩诉初衷 ——北京天则所开学术批评讨论新风·····	(160)

目 录

12. 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种特殊的交易
——再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166)
13. 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
——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 (170)
 附：评答成理各抒己见，学术有进共受其惠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评说《中国的奇
 迹》 (188)
14. 治水的政治经济学
——兼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 (194)
15. 经济学理论抽象的正确途径
——答评周冰先生 (211)
16.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经济学——1994》前言 (226)
17. 制度变迁与案例研究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前言 ... (252)
18. 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
——兼评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 (274)

自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个集子，收录了笔者 1989—1996 年写的一部分关于经济学著作的书评和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评论。这些书评和评论涉及到近几年来国内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著作。本人以为，这些书评和评论决非敷衍了事和滥竽充数的随意之作，而是严肃认真之所为。因而受到了学界同仁的肯定和重视。盛洪在《中国经济学——1995》前言中有一段评论，对此作了一个恰当的概括，现抄录如下，并作些进一步的说明。

“张曙光教授从几年前开始，就对‘广告式’的、‘推销式’的书评颇为反感，曾写过抨击这一现象的文章，并发表在《中国书评》上。近一二年来，他自己身体力行，开展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论文的严肃的批评，写了数篇高质量的书评和文评。就我所知，有对盛洪的《分工和交易》的评论，刘世锦的《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的评论，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的评论，卢跃刚的《辛未水患》的评论，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评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对王绍光和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评论，也许更能反映出他对批评的严肃态度，因为较之上述几本书和文章，他对这本书持更强的批评态度。所以也许我们能从张曙光教授的批评中学到的，不仅是他对政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还有他为建立公平的批评和反批评规则

所持的态度以及所做的努力。”^①

我写的第一篇书评是评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②，那是 1983 年的事情。当作者请我为他的大作写一书评时，我即明确表示：既然信任我，我愿意承担，但是写什么，如何写，得按我的想法来办。在这篇书评中，我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该书的内容特点以及作者在理论上的前进和创造；另一方面，用了一半的篇幅分析了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和不足，在一定意义上，对当时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作了一个概括的评述。今天来看，当时短短的几句约定以及迈出的第一步，为此后的行为确立了一个必须遵循的规范和用以度量的标尺。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本文集的各篇论文中。

我对书评的重视始于 1989 年。这也是本文集从该年开始收录的原因。当时，在读书的同时，也读了一些书评。看到一些书评很象商品广告，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家的科学评价，而是作者假借评者之口的王婆卖瓜。因而，才有了“从书评和广告的区别谈起”的一段文字（见本书第 23 页）。如果说这时对书评的现状有所质疑的话，那么，到了 1992 年，看到学术刊物上的书评基本上都是“广告式”、“推销式”的，就非常不满，甚至有些气愤了。于是，我对当时《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樊纲说：你们刊物上发表的书评简直不象样子，我真想写一篇关于经济学书评的书评。樊纲认为此议甚好，即与编辑部商量，要我尽快写出，下期就发。时值盛夏 8 月，我仔细阅读了《经济研究》1990—1992 年 6 月两年半中发表的 24 篇书评，写了《论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

① 盛洪：《会有—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载《中国经济学——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张曙光：《再生产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评王梦奎〈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载《经济研究》，1983 年第 3 期。

价》一文。我把文章送给巫宝三先生审阅，巫老仔细阅读了拙文，除对该文的基本观点表示赞同以外，对文中的一些表述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两大页。此举令我十分感动。巫老的行为为我们树立了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的榜样。由于该文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编辑部两次发稿，均被主管杂志的负责人扣压下来，未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幸而邓正来先生创办《中国书评》，约我评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我把这段故事一讲，该文才在两年以后与读者见面。故事的曲折，即成为我此后认真写作书评的一个原因。

关于书评的性质及其在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在有关评论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在这篇序文中只想谈谈写作书评的一点感受。

读书是写作书评的基础和前提。评书就得读书，而且要认真地读书。因此，写作书评是促人读书的一个好方法。很多人都感到，事情多，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久而久之，投入产出比例失调，作品质量下降。究其原因，一是自己没有需求，二是身上没有压力，以至工作是硬指标，读书成为软任务。写作书评可以促使你去认真读书。首先，要写好书评就要认真阅读所评之书，而且读一遍不一定能够准确把握。书中的精华和学术上的创新，理论上的缺陷和偏颇，进一步深化和前进的途径和方向，都是在反复阅读和思考中逐渐形成和明确的。其次，还要广泛阅读与所评对象论题相关的有关著作，从这种阅读和比较中，你才会了解所论问题的历史发展，弄清作者切入的角度，对作者作出的独特创造或在理论上的失足之处，作出恰当的评价和中肯的批评。这个集子中的一些书评，就是在这种比较中揭示出作品的高下优劣，笔者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领悟了很多道理。因此，写作书评并不象有人认为是浪费时间，吃力不讨好，是为他

人作嫁衣，而是一个读书学习、获取知识的良好机会和重要途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他的知识和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此论颇有道理。一篇好的书评，对于评论者、被评者和读者，都会有多方面的巨大收益。

在我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中，很多人对写作书评感到为难。说好吧，有违本意；批评吧，不合时宜。其实，大可不必顾忌过多。只要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只要本着科学良知，批评和反批评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双方都欢迎的。作为评论者，必须与所评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这里，用得着人们常讲的一句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具体说，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对于名家及其作品，虽然必须十分慎重，但不可过于谦恭，自惭形秽，该肯定、该褒奖的应当肯定和褒奖，该批评的也要大胆批评。事实上，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创新，都是从批评现有名家的观点中发展起来的。二是对于一般作者，特别是年青作者，更要特别爱护和扶植，不可摆出一种权威的架式，居高临下，进行裁决，而要与之平等地讨论商榷。三是无论是评论什么样的作品，一不能怀疑作者的动机，二不能怀疑作者的智力，要尊重作者的人格，不能误解和曲解作者的观点，更不能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强加于人。态度应当严肃认真、诚恳谦和，不能尖酸刻薄，冷嘲热讽。这是写好书评应当具备的起码态度，也是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的基本准则。

书评有多种写法，不拘一格。可以作全面的评价，也可以就其中的某一个观点进行讨论；可以辩论理论观点的是非曲直，也可以计较方法运用的正误短长；可以在理论上作进一步开拓前进，也可以着眼于理论的运用和政策的实践；可以进行同一理论对象不同分析的比较，也可以对理论假说进行证伪和检验；可以褒扬，也可以批评，等等。无论取何种作法，都必须注意一点：

陈述虽然必不可少，也是评论的基础，但必须以评为主。缺少评论或评论不足，书评也就失去了灵魂。在写作书评时，自然是以本行专家评论本专业的著作为主，但也不排除从本专业的角度去评论其他专业的著作。这种评论也许会给人一个新的视角和一种新的意境。笔者在撰写《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兼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时，对此颇有感触。该文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评论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这在书评方面也并不多见。但却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一些重大的尖端问题，并且有所前进。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描述和分析的对象即使不是完全相同的，也是相通的，只是各个学科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考察而已。这种交叉的评论，对于两个学科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以及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和合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评论只是一家之言，其片面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只好敬请作者和读者原谅了。其他人完全可以作出与笔者不同的评论，也有权对笔者的评论进行再评论，特别是对笔者的批评进行反批评。这是本人热切希望和求之不得的。我觉得，中国经济学以及各个科学的繁荣有赖于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本人也愿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再尽绵薄之力。

此外，有人对文集比较看轻，认为比不上专著的规格档次。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和形式化味道太浓。笔者以为，问题不在表现形式，而在内在质量。好的专著不仅要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要有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和充分的论证。如果内容比较单薄，论说也不充分，虽有新的发现和前进，也好像一杯醇酒，兑上了很多白开水，就不那么醇美，不那么甘甜了。相反，很多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最先都是出现在论文中的。而

且，由于篇幅的限制，论文的阐述和分析往往更集中，更简洁。因而，阅读一本好的文集，也许比阅读一本专著得到的更多。这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假定：成本收益分析和理性行为假定。

我的研究和写作多得夫人张双的理解和支持。本文集中有三篇评论是我利用 1994、1995 和 1996 年三个春节的假期读书写作的，本书的出版就作为对她所作牺牲的一点补偿和慰藉。当然，时光不能倒流，失去的东西无法复得。本书的面世还要感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张立宪先生。他为此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96 年 6 月 10 日于北京三里河

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咨询^①

——经济学研究中必须明确的 几个方法论问题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体制改革的推进和青年一代理论工作者的成长，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局面，不仅探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开始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趋向。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解释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很多人转而从西方经济学中寻找答案，结果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有着理论思辨的光荣传统，但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却又如此贫乏；人们在经济理论方面缺乏大胆创新之举，而在政策实践方面，却又喜欢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这也许就是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现状。形成这种状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同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所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很大关系。近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以不同方式和在不同层次上开始进行思考和探索。本文想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如价值判断问题、真理成份问题、政策咨询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这里不是单纯讨论哲学问题，而是考

^① 本文系与杨仲伟合作。

察经济科学中科学学的基本问题。

一、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同志明确提出了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问题，并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认为经济学研究需要进行价值判断。^①但是，这种回答过于笼统，没有具体说明价值判断是否存在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始终以及各个领域。如果是，那么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究竟与人们日常生活和政治选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是，那么在经济学研究的哪些过程和哪些领域可以保持价值自由前提，以及在保持价值自由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政策咨询，如何保持科学家的伦理道德，如何推进科学研究的进步，这些都是经济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就有可能走到“自然归谬”的歧途上去。

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指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例如：我国现有的收入和财产分配状况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货膨胀比增长滑坡更好；5%的通货膨胀比5%的失业更好；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和行动纲领、进行宣传鼓动不可缺少的适当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可以区别开来而且

^① 见朱嘉明、盛洪：《论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载《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

应当加以区别的。

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做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如某人认为现行财产分配是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断者所持的不赞成的立场。但是，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它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即不能提供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所有与真理相联系的认识，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证明是真理。在经济学研究中，事实判断除了包含有关经济过程的一般事实和论断以外，集中表现为效率判断。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例如，财富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公正”与否的评价是判断者主观加上去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而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是一个与道德原则无关的标准和规范。当然，价值标准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来说明其正确与否。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还要进行效率再判断。这就要看它是否代表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进步力量，是否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

指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和联系，强调事实判断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来看，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可以保持价值自由。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依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在这里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探索起了重要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因此,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

有人从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出发,反对在认识内容领域保持价值自由前提。这是由于混淆了以下几个问题的界限。

1. 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理论的建构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所要解决的是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或者说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规范力量和改造力量。理论的可接受性则是一个文化价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论的功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哪一种理论更好、更易于被决策者采纳,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张。这与其说取决于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决策者的素质等等,因而在这里需要进行价值判断。

2. 经济理论的专家选择和社会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选择。前者是要解决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是通过经济学家的批判、检验和证伪来进行的。在这里,经济

理论的客观性外化为一种公共性，即不同专家从不同方面进行检验所作出的共同选择。具体表现为比较的一致性、实验观察的可重复性、与参照系变化无关的不变性等。^①而后者所要解决的是经济理论在社会空间中的可行性问题，它是由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作出的选择。政治家有他的选择标准，形势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识限制都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大众的选择更会受形势变化、社会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的学习过程，理论才能变成社会大众的共识和集体行为。

3. 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这也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可以明确分开的行为和过程。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咨询表现出来的，而经济政策咨询的核心是提供有关经济过程客观联系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规范性预言或价值判断所能给予的，但从内容丰富的理论中都可以得到付诸实施的行动信息。同时，一个无价值判断的科学结论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经营者进入决策和选择的权力。经济学家可以参与政策决策，但这绝不是说作为经济学家处在理论认识形成之中，而是作为政治家、经营者处在政治活动和经营活动之中。因此，经济科学的实际应用目的不必要也不应该要求经济学家在其理论认识过程中求助于价值判断。与此相反，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则有助于科学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价值偏见的干扰和影响。

这里还应提出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科学家的伦理道德问题。有人认为，科学家从事何种科学规划，帮助实现何种价值目标，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科学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依靠自我控

^① 参见古祖雪：《玻恩的科学方法论思想》，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制，很难在其科学表述中保持价值判断自由，即科学家会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在自己的理论认识和科学表述当中，这是造成很多理论结论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同时，科学家也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功利，它与社会目标和社会功利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询建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以至变成官方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在政策咨询中很难保持客观立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在科学活动中通过对其科学表述进行相互批判和证伪，通过实践来检验。然而，价值判断同批判和证伪过程，同经验检验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一个科学家，谁要想在科学研究中作出真正的创造，他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为此他就必须承认价值自由的前提。

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不仅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区分，也不必区分的，而且过分注意和偏爱价值判断，往往使事实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不仅在研究对象选择、认识目的确定等对象和基础领域强调价值判断，而且把在研究内容领域和认识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遮羞布。这就使得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所设置的价值判断的陷阱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如市场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无”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对它如何进行描述。如果姓资，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否认它的存在，或者在共同的地方也要寻求它们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样，就把上述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不仅如此，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同一个问题，如当前经济运行的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概括和事实归纳，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

不同的结论，甚至要先看看气候，听听风声，然后投其所好。这就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进展，使得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政策的俗套。长此以往，理论不但难以改变落后于现实的局面，而且还有被窒息的危险。近几年来，大家都承认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语言。这不仅是由于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混乱的缘故，而且主要是由于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的结果。因此，为了发展经济科学，在认识内容和理论形成过程等事实判断领域，保持价值自由前提，应该成为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经济学理论的真理成份问题

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一般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在既定的公理体系下面，不断改进论证方式，寻求新的经验证据，补充和完善已有的结论；一条是推翻原有的理论体系，提出新的理论假说，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实践证明，这两条路都能够作出出色的理论创造。但究竟具体选择哪一条道路才能成功，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当着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刚刚建立起来、还很不完善的时候，选择前一条道路也许是正确的。当新的经验事实同旧的理论在整体上发生矛盾、失去平衡，而且这种矛盾和失衡现象无法通过局部改变和补充旧有理论得以解决的时候，再选择前一条路子，不仅不能推进经济科学研究的进步，反而只能起到维护旧理论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第二条道路。我国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已在根本上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相抵触，越来越丧失了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因此，唯一合理的选择是，从对原有理论大厦和规律体系的大胆质疑出发，重新概括和